



公共产品供给 促进反脆弱发展： 甘孜藏区发展策略研究

Public Goods Supply Promote Anti-Vulnerabil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arze Tibetan Area

李雪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共产品供给 促进反脆弱发展： 甘孜藏区发展策略研究

Public Goods Supply Promote Anti-Vulnerabil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arze Tibetan Area

李雪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反脆弱发展: 甘孜藏区发展策略研究 / 李雪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203 - 1208 - 0

I. ①公… II. ①李… III. ①公共物品—供给制—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甘孜 IV. ①F127.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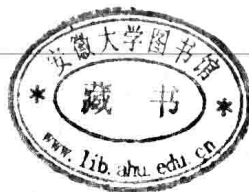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47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 萍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470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上篇 公共产品供给与反脆弱的理论阐释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脆弱到反脆弱：公共产品供给	(33)
第一节 研究视角：脆弱性理论	(34)
第二节 公共产品供给：突破发展陷阱	(53)
第三节 反脆弱的微观目标：改善农牧民生计	(58)
第四节 反脆弱的宏观目标：促成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耦合	(80)
第五节 反脆弱的核心：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	(88)

中篇 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区域反脆弱

第三章 甘孜藏区区域脆弱性	(103)
第一节 区域脆弱性特征：脆弱性交织	(103)
第二节 脆弱性之于自然环境：严酷多灾	(118)
第三节 脆弱性之于产业特征：无工不富	(126)
第四节 脆弱性之于财政收入：外部依赖性强	(135)
第五节 脆弱性之于基础设施：瓶颈制约	(153)
第四章 突破陷阱：反脆弱的基本内容	(168)
第一节 反脆弱之突破点：公共产品供给	(168)
第二节 反脆弱之于政府：制度建构与行动选择	(175)
第三节 反脆弱之于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瓶颈制约	(186)

2 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反脆弱发展

第四节 反脆弱之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 (196)

第五节 反脆弱之于基本生活：居住变革 (207)

第五章 突破陷阱：反脆弱的路径选择 (215)

第一节 反脆弱之路径特征：满足多重需求 (215)

第二节 反脆弱之主体集结：资源整合 (218)

第三节 反脆弱之能力提升：联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 (231)

第四节 反脆弱之效用扩展：联结供应和消费 (236)

第五节 反脆弱之轴心把握：亲贫式增长 (248)

下篇 公共产品供给缓解生计脆弱

第六章 公共产品供给从无到有：生计方式变迁 (263)

第一节 双重形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甘孜州农牧民
生计脆弱 (263)

第二节 甘孜解放到民主改革前：开始供给公共产品 (273)

第三节 民主改革后：公共产品供给增量 (286)

第七章 村庄禀赋差异：生计方式有别 (291)

第一节 农牧民生计分类 (292)

第二节 牧业型村庄禀赋及生计脆弱 (295)

第三节 双亦型村庄禀赋及生计状况 (299)

第四节 三亦型村庄禀赋及生计状况 (309)

第五节 村庄禀赋直接影响农牧民生计 (314)

第八章 生计资本差异：农牧户贫富有别 (318)

第一节 富裕家庭生计状况及其致因 (318)

第二节 贫困家庭生计状况及其致因 (323)

第三节 中等收入家庭生计状况 (329)

第四节 家庭生计资本使得农牧民贫富差异 (331)

第九章 民间抗逆力建构：生计的基本支撑 (333)

第一节 地方性知识：民间抗逆力的智力支持 (333)

第二节 家庭生计策略优化选择 (337)

第三节 社区抗逆力：生计改善的助力	(342)
第十章 政府抗逆力建构：公共产品供给改善生计	(345)
第一节 政府抗逆力建构中的公共产品分类	(345)
第二节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深刻改善生计	(347)
第三节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生计改善	(352)
第四节 基本生活设施建设改善生活	(357)
第五节 各项生产生活补助增加现金收入	(359)
第六节 基本社会保障供给努力托底	(366)
第七节 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生产能力	(368)
第八节 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牧民生计	(374)
参考文献	(378)
附录	(394)
附录一 幸福甘孜工程	(394)
附录二 村庄调查表	(404)
附录三 农户访谈提纲	(410)
后记	(412)

上 篇

公共产品供给与反脆弱的理论阐释

第一章 绪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习近平总书记将藏族地区的治理提高到我国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的更宏大场景以及更高的思维层面上。

一 问题提出

国家治理、边疆治理中，对于特定的社会（如连片特困地区^①）来说，社会生活的中心组织原则是发展。^②发展是贯穿我国20世纪大部分时间（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主要背景和延续运动，甘孜藏族自治州（俗称康区、康藏、甘孜藏区^③）的发展是中国发展宏大场景下的区域问

①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新时期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主要分布区，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的诸多藏族自治州）、新疆南疆三地州。本书关于甘孜藏区发展策略的研究指涉的区域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属于四省藏区的一部分。

② 岳天明：《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③ 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在的地区习惯上称为“康区”，“康”（藏文ཁོང་ཁོང་།，藏语拼音 Kam），又称喀木、朵康（藏文ཏོ་ཁོང་།）、朵甘思、朵甘。康区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地区，常与卫藏和安多并列，康区居民称为康巴（藏文ཁོང་ཁོང་།），主要通用藏语的康方言。历史上康区的范围大致包括：（1）现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东部（聂荣、巴青、索县、比如、嘉黎）、林芝地区东部（察隅、波密、墨脱）；（2）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3）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4）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元朝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管辖康区，明朝设朵甘都司，民国时期设西康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区的核心地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影响，人们习惯性地吧云南省迪庆州称为“云南藏区”，青海省玉树州等称为“青海藏区”，甘孜州即“甘孜藏区”（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康区）。

4 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反脆弱发展

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整体性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实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语义，贯穿着以技术—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其中，扶贫或反贫困^①是核心议题。^② 国家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着中国各地，也改变着甘孜藏区。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位于甘孜州西北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是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四省藏区的一部分。甘孜有着连片特困地区的共性，是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贯彻落实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③ 是年年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把稳定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④

连片特困地区相对于一般贫困地区有其突出特征。一是贫困的集中性——人口集中，地域连片。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区、限制开发区，多呈片状或带状分布，且多是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也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它们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二是贫困成因的复杂性。贫困成因有自然的、社会的因素，民族的、宗教的因素，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等，而且多种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例如自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并存。连片特困地区多是生态高度脆弱地区，缺乏从事大规模产业化经营的必要基础，而且会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汇聚了民族、农村、山区、边疆等多重命题，当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就需要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分析其发展困境和减贫道路。三是贫困程度的深沉性。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较深，因此贫困治理任务艰巨，且对贫困治理手段综合性的要求特别高。一般贫困地区的阶段性、临

① 关于扶贫、反贫困有各种学术术语，如减贫、贫困治理等更有学术意蕴的表达。在本书中，这几个概念基本一致，可视为等同。

② 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④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2011年12月1日。

时性贫困较多,缓解贫困相对容易,但在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面大而且程度深、区域内整体贫困突出、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强,陷入了“贫困—发展不足—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发展缓慢。连片特困地区的特征,使得一般经济增长已难以带动其发展,即使有一定的发展,也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或者很快又恢复旧貌,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如此种种,已有的贫困治理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像甘孜藏区这样的连片特困地区,发展是核心主题,但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思考。如什么是发展?发展以什么为基础或起点?怎样发展?发展什么?谁得到发展?上述是宏观层面的思考,在微观层面,还需思考区域发展过程中,如何改善农牧民生计。因为区域发展最终都应该也会直接体现在农牧民生计状况及生活水平上。

二 思考与追问

甘孜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从区位条件来看,具有偏远、高海拔、环境脆弱、贫困等民族地区共性;从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相同的组织变迁及制度变迁;在应对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矛盾。这些共性使得甘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相类似的青藏高原地区,甚至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甘孜也有个性: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面临着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传统农牧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碰撞中,藏文化张力膨胀与边际错位更加凸显。甘孜贫困人口集中、脱贫难度大,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调适性等都不可多见。也就是说,研究甘孜这一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身的地区,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来说,不失价值和意义。

减贫以及发展路径的选择、发展目标的实现等都需要有背后的制度安排及其支撑。“体面的生活水平、足够的营养、医疗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进步不仅仅是发展的目标,它们是与人的自由和尊严紧密相连的人权。但这些权利……要求一系列的社会安排,如准则、制度、法律和能发挥作用的 经济环境等,以便最好地保障享受这些权利。”^① 寻求甘孜藏区减贫及发展路径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需要追问与反思相关问题,例如何谓“贫困”?如何才称得上“发展”等。

以新的发展观为学理视野来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分析

^① 世界银行:《2000—2001 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6 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反脆弱发展

其社会变迁和发展成就、冲突和障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学理话题，其中包括减贫理论、发展理论与新发展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拓展思维提供了土壤。

甘孜藏区属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是其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即“贫困”是讨论其发展的基本场景。

贫困可以表现在个体、群体层面，也可以表现在区域层面。就个体和群体而言，学术界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变迁。收入贫困是指人们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能力贫困是指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权利贫困是指社会成员应享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权利贫困是贫困的社会后果和本质，三者交织、互补和互动，而不是替代和对立。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贫困的外延由物质扩展到社会、环境、精神文化等方面。贫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落后（物质稀缺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还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有关，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心理因素，即贫困产生于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相互影响的互动中。^① 贫困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借助物质财富的形式展现出来。^②

区域贫困的研究有各种视角，生态视角是其中之一。在寻找贫困成因时，与甘孜藏区较为吻合的研究视角之一是生态视角。生态贫困论的代表人物是 M. P. 托达罗，他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考察贫困，认为地区性贫困是由自然环境过于恶劣而引发。据其所论，贫困地区往往具有恶劣的气候特征，暴雨频繁直接摧毁道路、桥梁和建筑物，导致土壤流失，影响农作物生长；高温和干旱引起土壤有机质流失，导致土壤结构恶化，肥力衰退，诱发虫害、病害，牲畜疾病增多；高温和干旱还使得劳动者体质下降，降低生产率。学者们在 M. P. 托达罗的分析基础上引入人口压力，从生存空间角度来论述贫困的发生。他们认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地区所承载的人口容量具有临界点，超过该临界点则造成人口生存空间不足，无法保证基本生理需求的生活水平，该理论大致等同于人口数量挤压论。生态贫困论者的反贫困途径在于改变生存空间，具体是改善土地质

① [美] 杰拉德·迈耶：《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樊勇：《贫富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 刘国虎：《贫困及其现代性话语表达》，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2年。

量、移民和人口控制等。^①生态贫困论对甘孜藏区的贫困有一定的解释力。

甘孜州是我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的主体和核心地区。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地域分布、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仍非常落后，农户贫困严重、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返贫严重造成贫困治理难度大。第一，绝对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经济贫困与知识贫困、权利贫困并存；返贫人口数量大、返贫现象严重。第二，人力资本含量较低，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薄弱，农牧民健康状况差，社会参与度低。农户的物质资本相对短缺，恩格尔系数大于50%，处于温饱阶段。第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病和传染病高发、落后的观念等是导致农户贫困的原因。第四，从家庭—社区视角来看，乡村地形和自然灾害、农户的教育水平、外出务工、医疗救助、灾害救助都对农户贫困产生重要影响。^②总之，甘孜藏区的贫困，就个体、群体而言，直接表现为收入贫困，潜藏其后的是农牧民的能力贫困；就区域来说，生态贫困特征明显；就时间存续而言，是慢性贫困。

贫困治理研究归属于社会政策和发展学派。社会政策提倡通过社会福利救助来维持收入，发展学派主张通过经济发展来消除贫困。发展主义认为，对落后地区的扶贫要建立在工业发展的经济增长基础上，也就是期望通过经济援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增长，来帮助落后地区的穷人。^③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社会政策和发展学派都忽视了家庭生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忽视了穷人自身的能力和抗逆力，并不能保证穷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④。基于此，学术界提出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要促进落后地区穷人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必须分析他们的整个生计要素：资本（capitals）、能力（capabilities）和资格（entitlement）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在的社会环境，实现家庭生计和外在环境的互动，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生计。^⑤

贫困治理、发展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

① 郭佩霞：《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7年。

② 李燕玲：《四川民族地区农户贫困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农业大学，2011年。

③ [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Brighton: IDS, 1992.

⑤ 郭伟和：《“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同回答，形成了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之争，新发展主义是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性发展。总体思路，发展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方式与路径，因发展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实践中的失败，新发展主义在对其批判中诞生。新发展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自己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在发展的内容上，发展主义注重经济指标，将丰富而多元的人类需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新发展主义基于文化自觉，主张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型发展。也就是说，新发展是基于文化价值的整体的发展，是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统一，不应只是GDP的片面发展；发展应当是综合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发展不同地域、社会各阶层之间内聚力的强化，是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在国家调节作用下的稳定发展；新发展必须是内生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动态的、主体力量的动员，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人力资源开发。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发展中国家的路径选择，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建设历程中已有映载。新发展主义理论既适用于分析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抉择，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发展道路抉择。^①

在学术之争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发展做出了基本规范，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类发展包括人类的能力形成和能力的运用。人的能力包括：拥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取更多知识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199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增加了环境和居民自由两个因素。总之，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发展指的是创造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环境，使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获得富有创造性和丰富多样的生活。进一步讲，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基本能力，是获得健康、知识、资源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的能力，没有这些能力，就不可能得到生活中的其他机会。

滞后于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国内减贫研究的很多文献以“效率”为

^① 周穗明：《西方发展主义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叶敬忠、孙睿昕：《发展主义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俞郭斌：《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主义：中外新发展理论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吕方：《“新发展主义”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李胜：《新发展主义与后现代解构》，《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曾毅：《新发展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孙凤娟：《发展主义视角下的民族社区环境审视》，《西安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标准来探讨民族贫困问题，无论是政府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考察，还是反贫困方式的甄选，都过分注重经济效益。用简单复制技术性方法来分析复杂的社会性问题，这是相关研究的不足。以工具理性为贫困的基本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解释与民族贫困息息相关的诸多现象，诸如宗教开支以及一系列农牧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基于工具理性，民族地区反贫困研究不约而同地走上制度化的分析之路，理所当然地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实现形式界定在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上，而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特定地域的国内分工等方面考虑甚少；对于反贫困资源配置、扶贫项目选择、反贫困技术采用等，过分倚重国外和国内汉区反贫困经验与做法，忽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域差异、思维方式、民族文化、政治和历史、传统与习俗背景以及以汉文化思维模式同一性地简单推行民族地区的扶贫战略，无论在技术推广上还是项目选择上都表现出强制性、机械移植特点；在反贫困力量探讨上，对于政府这一主体，大多研究视其为既定物，抽象而概括地总结其应有的反贫困功能，舍弃了政府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机制内部的功能分析和演绎的规范分析，难以揭示出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内在实质性。^①

对我国而言，发展是主要任务；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发展更是主要任务。^②应该说，如今的中国是长时期具有混合特性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必须抛弃简单化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当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内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而且发展过程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时，以新的理论视角去探求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就具有了鲜活的生长气息。尤其是在贫困治理的新时期，已有制度的效应释放殆尽，新制度的建构需要十分审慎。从全国来看，减贫的主要成就来自制度变革（主要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以及迅速的工业化，^③ 甘孜藏区也是如此。但是，当一波波已有制度的减贫效应释放殆尽时，建构未来减贫制度的意义凸显。新制度的建构及其实施，彰显着发展路径选择的重要性。正如有学者认为，必须综合考察现代中国的政治理念和行政架构，才能理解作为问题的贫困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就是说，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政府贫困

① 郭佩霞：《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7年。

② 王珏、吴定勇：《关注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视野互动与观点交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学术界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工厂—打工经济（由农民工外出就业和打工收入汇款）构成的经济收入循环，是农村减贫的重要因素，如墨菲、朱晓阳等。

治理的制度建构及其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缺乏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能够保证扶贫政策让贫困人口从中直接受益。由于很多贫困人口集中于贫困地区，所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本身（无论它是如何有利于贫困者）无法解决这些贫困问题。而且随着市场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形式的风险、脆弱性和新的贫困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差距的扩大将不断产生，传统的以地理区域为扶贫目标的扶贫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于解决严重的贫困现象了”。^① 况且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不同的地区行经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先发地区遵循“先导式发展”路径，基于自身优势，并不断强化优势，促进发展。^② 藏区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多重脆弱性交织是其区域特质，也是发展的陷阱。^③ 由此，不得不追问，与先发地区相比，藏区的区域发展路径可否另辟蹊径？

在甘孜藏区，农牧业经济依然是支柱，乡村社区及其贫困人口需要依靠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以实现脱贫，甘孜作为生态产品生产区域，工业化前景堪忧，当一波波已有制度的减贫效应释放殆尽时，未来减贫制度将怎样建构？实践中，国家—政府层面的扶贫工作倾向于把贫困问题化为经济—技术问题，所以“改善自然环境，加强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发展”等提法成为各类文件及政策建议的主要内容。^④ 毋庸讳言，在甘孜已有的发展中，“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依然是发展理念和行动实践。只是，鉴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思考一系列甘孜自身的问题：农牧民如何改善生计？劳动力如何从传统农牧民生产中转移出来？如何努力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因为科学的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多种因素相协调；衡量发展的尺度，除了经济指标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如营养、衣物、居住、保障、教育、闲暇、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并重视“人的质量开发”，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① 朱晓阳：《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李雪萍：《反脆弱性发展：突破发展陷阱的路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③ 陈艾、李雪萍：《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④ 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